



乱世离歌里的太平年

王小柔



《乱世离歌：五代史略》，陶懋炳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热播剧《太平年》以五代十国为时代背景，用跌宕的权谋叙事、鲜活的人物群像，将这段乱世拉回大众视野。剧里，藩镇铁骑踏碎唐室残辉，江南烟雨守得一方安宁，石敬瑭的屈膝、钱鏐的守土、柴荣的壮志，一个个历史人物从史料中走出，在艺术演绎里有了别样的温度。但电视剧的艺术加工，终究是对历史的镜像折射。想要读懂五代十国，读懂为何这是中原最后一次大分裂，读懂乱世背后的社会变革，读懂分裂中酝酿的统一大势，答案均在陶懋炳的《乱世离歌：五代史略》一书里。

这部被称作“五代史研究开山之作”的著作，为我们描摹出五代十国最真实的社会图景。它不是冰冷的史料堆砌，而是以“断代史之体，通史之魂”，将半个多世纪的离乱纷争，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审视，让我们看到，五代十国从来不是单纯的“黑暗时代”，而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土族地主到庶族地主、从藩镇割据到中央集权的关键转型期。当《太平年》的剧情让我们对五代心生好奇，《乱世离歌：五代史略》便带我们走进历史的内核，看清乱世的乱，更读懂乱世的变。

艺术演绎乱世镜像

电视剧《太平年》演绎石敬瑭晋阳起兵、借辽建立后晋的情节时，作了诸多艺术简化与情感铺垫，剧中将石敬瑭的起兵塑造单纯受后唐末帝猜忌的被动之举，他向契丹求援的过程被轻描淡写，仅展现使者赴辽的片段，略去了核心的割地称臣细节，还简化了后唐平叛的战局，将张敬达率领的后唐军战败归结为辽兵势不可挡的必然结果，同时删减了赵德钧觊觎皇位、向辽行贿求立的关键情节，让石敬瑭的卖国行径多了几分“被逼无奈”的色泽，戏剧化突出了后唐末帝的昏庸与辽军的强悍。

陶懋炳在《乱世离歌：五代史略》中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则详实还原了其中的利益博弈与历史真相，明确石敬瑭并非单纯被动起兵，他早有篡逆野心，身兼太原尹、河东节度使等要职时便暗搜财物、控制禁军，还收买宦

近侍打探情报，为起兵蓄势已久；后唐末帝的猜忌只是导火索，起兵后石敬瑭因实力不足，由幕僚桑维翰献计主动向辽“贡表乞师，愿为臣子”，不仅甘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还许诺割让燕云十六州、岁输帛三十万匹；记载中还详述了后唐平叛大军本有胜算，却因副帅杨光远等诸将心怀异志、主帅张敬达无谋不备，才让辽兵轻易突破雁门，五后唐军反被困于晋安寨，更补充了赵德钧趁乱派使向辽厚赠金币，请求辽主立自己为帝，石敬瑭闻讯急令桑维翰至辽营长跪号哭、卑辞力请，才让耶律德光放弃与赵德钧的交易；最终张敬达投降被杨光远杀害，后唐军全军投敌，后唐遂亡，石敬瑭则在太原北门外柳林身着契丹服饰接受辽的册封，正式建立后晋。史书的记载客观揭露了石敬瑭主动卖国的本质，还原了后唐灭亡的内部腐朽根源，以及五代藩镇、契丹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与影视的艺术演绎形成鲜明对照，前者为追求戏剧效果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后者则以严谨的笔触呈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完整脉络与真实面貌。

《太平年》里，藩镇节度使拥兵自重，动辄举兵反叛，后梁朱温与后唐李存勖的夹河苦战，铁骑交锋的画面，还原了五代中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权更迭常态。53年间，中原五朝更替，最长的后梁不过16年，最短的后汉仅4年，帝王的宝座在铁骑与权谋中频频易主。

五代十国之所以成为史学研究的冷门，核心原因在于史料匮乏、头绪纷乱。这段乱世历时短暂，政权更迭频繁，加之战火连绵，史料散佚严重，宋代史家修史时，也多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对南方诸国和周边民族的记载寥寥无几。

对于中原五朝的更迭，作者不仅梳理了王朝兴替的时间线，更深入分析了背后的藩镇博弈、阶级矛盾；对于南方十国，他打破了中原中心的视角，分别论述了吴越、南唐、闽、南汉、前蜀、后蜀等政权的建立、发展与灭亡，详细记载了南方诸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状况。比如书中对吴越钱鏐的记载，引用了《吴越备史》《旧五代史》等史料，详细叙述了钱鏐平定两浙、修筑捍海塘、与吴和南

唐的博弈，甚至对钱鏐的“警枕”“粉盘记事”等细节都有考证，让这个南方割据诸侯的形象变得鲜活具体。

作者没有将五代十国孤立起来，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审视，“上挂下连”，既追溯了唐末藩镇割据的历史根源，也揭示了五代十国对宋代社会的深远影响。书中不仅论述了中原王朝和南方诸国的历史，还专章论述了契丹的崛起与中原人民的抗辽斗争，以及五代的周边各族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将五代十国写成了“整个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而非单纯的汉族王朝史。这种视野，让我们看到，五代十国不仅是中原的乱世，更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契丹、党项、吐谷浑等民族与汉族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为后来辽宋对峙的格局埋下了伏笔。

超越脸谱的历史人物

《太平年》试图打破历史人物的脸谱化，但艺术的演绎终究难以摆脱戏剧冲突的束缚。而在《乱世离歌：五代史略》中，陶懋炳以史家的客观与理性，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超越脸谱、立体鲜活的历史人物，他不刻意美化，也不刻意贬低，而是将人物置于时代背景中，分析其功过是非，让我们看到，五代的人物，皆为时代的产物，他们的选择，既有个人的野心与无奈，也有时代的必然与偶然。

五代的中原帝王，多为藩镇出身，身上带着鲜明的“武人特质”，他们或骁勇善战，或残暴嗜杀，或昙花一现，鲜有传统意义上的“明君”。比如后唐庄宗李存勖，他骁勇善战，率军灭后梁，统一中原，创下“夹河之战”的军事奇迹。陶懋炳肯定了李存勖的军事才能，却也深刻剖析了他灭后梁后的倒行逆施——耽于声色，宠信伶人，屠戮功臣，最终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书中写道：“李存勖的一生，是英雄与昏君的结合，他的成功，在于继承了李克用的基业，凭借沙陀铁骑的骁勇；他的失败，在于不懂治世，失去了民心。”这种得失，跳出了“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让我们看到了人物的复杂性。

而对于被后世唾骂的石敬瑭，作者也并非一味批判，而是将其置于藩镇博弈的时代背景中，分析其割让燕云十六州、甘做“儿皇帝”的深层原因。石敬瑭本是沙陀平民后裔，凭借骁勇成为后唐明宗的女婿，手握重兵，却因后唐末帝的猜忌，被逼起兵反叛。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向契丹求援，以割地称臣为代价，换取契丹的支持，最终建立后晋。石敬瑭的卖国行径，固然是其个人的耻辱，但也反映了五代中原藩镇的孱弱与无奈。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彼此攻伐，中原王朝实力大损，难以与崛起的契丹抗衡，石敬瑭

的选择，不过是藩镇博弈的极端产物。燕云十六州的割让，让中原失去了北方的天然屏障，此后数百年，中原王朝都面临着契丹的威胁，这也是五代留给后世的巨大隐患。

与中原帝王的残暴与短命不同，南方诸国的君主，多有“保境安民”的意识，而钱鏐便是其中的代表。在《太平年》中，钱鏐是一个重情重义、“保境安民”的明君形象，而在《乱世离歌：五代史略》中，作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更全面的钱鏐。他出身寒微，以贩盐为盗，后应募从军，平定两浙，建立吴越。他深知吴越地狭兵少，难以与中原和周边政权抗衡，因此采取“事大保国”的策略，向中原王朝称臣，换取吴越的安宁。同时，他重视民生，修筑捍海塘，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招徕商旅，让两浙地区在乱世中得以安定繁荣。

作者详细记载了钱鏐的治浙举措，比如他的“警枕”制度，每晚以圆木为枕，缀铃于上，睡熟则枕铃敲响，即刻醒来处理政务；他执法严明，即使是自己的亲眷犯法，也绝不徇私；他自奉节俭，衣服衾被皆用细布，非公宴不用金玉。钱鏐也有割据一方的野心，他在吴越建宫殿、称朝廷，三次改元，僭越礼制，但这些野心，始终被“保境安民”的底线所约束。正是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让吴越成为五代十国中历时最久的政权，也让两浙地区得以躲过战火，为宋代江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乱世离歌：五代史略》中，没有完美的“明君”，也没有纯粹的奸臣，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缩影，他们的命运，与五代十国的乱局紧密相连，而这，正是历史的真实模样。

五代的乱与统

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地主的大庄园经济占据支配地位，士族门阀凭借门第，垄断仕途，成为左右皇权的重要力量。而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士族地主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甲第朱门无一半”“天街踏尽公卿骨”，士族的大庄园经济土崩瓦解，庶族地主的庄园经济逐渐兴起。

五代的帝王和藩镇，多出身寒微，朱温是流氓，王建是盗贼，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是沙陀军人，郭威是黠番皇帝，钱鏐是盐贩，杨行密是走卒，李昇是流浪孤儿。这些人没有门第背景，凭借骁勇或权谋，在乱世中崛起，成为政权的核心。五代的社会基础，已经彻底改变了唐代士族与庶族合流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挥舞长枪大戟的武人和听其支配的官僚”，而这种社会基础，也让五代的政权具有鲜明的“武人政治”特征。但同时，这种武人政治难以长久，因为武人只懂征战，不懂治世，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混乱，百姓苦不堪言，这也统一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乱世离歌：五代史略》

着重论述的内容。唐末以来，中原战火连绵，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诸国则采取“保境安民”的策略，少了战火的摧残，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比如吴越的捍海塘、南唐的纺织业、蜀地的茶业、闽地的海外贸易，都在五代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南方的经济发展，不仅让南方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也为宋代江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五代虽乱，但统一的种子始终在萌芽，从后梁的初步统一中原，到后唐的扩大疆域，再到后周的改革，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后周世宗柴荣，他是五代最有作为的帝王，在位期间，推行改革，恢复生产，整顿禁军，南征北战，西取四州，三驾淮水，北伐契丹，收复瀛、莫二州，为宋代的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柴荣的改革，不仅增强了后周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让统一成为时代的共识。而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不过是摘取了后周改革的果实，完成了五代以来的统一大业。

乱世史著的当代价值

从大众阅读的角度来看，《乱世离歌：五代史略》是一本难得的“通俗正史”。陶懋炳虽为史学家，但他的文字却深入浅出，没有晦涩的史料堆砌，而是以生动的叙述，将五代的历史娓娓道来。书中既有严谨的考证，也有鲜活的细节，既有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也有对历史人物的评述，让普通读者也能轻松读懂这段乱世。

长期以来，人们对五代十国的认知，多停留在“黑暗、混乱、倒退”的层面，这其实是受了宋代文人陈腐观念的影响。作者认为，五代十国并非单纯的倒退，而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士族的衰落、庶族的崛起、经济重心的南移、民族的融合，都在这段乱世中悄然发生，而这些变革，也为宋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观，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在曲折中前进，分裂与混乱，往往是变革与统一的前奏。

《太平年》以艺术的方式，让五代十国这段冷门乱世走入大众视野，而陶懋炳的《乱世离歌：五代史略》则以史学的严谨，为我们解码了这段乱世的乱与变。我们沉浸在电视剧的剧情中，为五代的人物命运唏嘘不已时，不妨翻开这本《乱世离歌：五代史略》，走进历史的真实。

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铁蹄踏碎的唐室残辉，也能看到江南烟雨的安宁繁荣；能看到帝王的残暴与无奈，也能看到百姓的苦难与坚守；能看到分裂的混乱，也能看到统一的必然。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乱世，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型期，它的乱，是旧秩序的崩塌，它的变，是新秩序的酝酿。而《乱世离歌：五代史略》，则为我们留住了这段乱世的记忆，让我们读懂了五代。

房间里有文学星河

王晨辉

当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喊出“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她必须拥有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不仅点出了创作对独立空间的刚需，更道破了创作与文学之间深层的共生关系。空间从来不是创作的背景板，而是作家精神的栖居地、灵感的发酵罐，是让文字落地生根的土壤。《有故事的房间：伟大作家们的创作空间》，便以50位世界顶级作家的创作空间为线索，跨越大洲、穿越世纪，带领读者走进那些孕育了经典的私密角落，寻找故事背后的故事，揭秘文学大师的灵感之源。这不仅是一本文学爱好者的圣地巡礼指南，更是一场灵感与空间的对话，一次对文学大师生活与创作的深度窥探，让我们在桌椅、书架、窗棂之间，触摸到文学最鲜活的味道。

作为一部充满趣味性的人文艺术作品，《有故事的房间：伟大作家们的创作空间》的核心魅力，在于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作家私人世界的大门。在文学的世界里，我们早已熟悉简·奥斯汀的细腻、狄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的硬汉、村上春树的温柔、J.K. 罗琳的奇幻，却很少思考，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字，究竟诞生在怎样的空间里。作者用一场跨越几个世纪、涵盖不同流派的文学探索，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

他的笔触走遍了世界各地，从加利福尼亚州圣拉斐尔的林间小屋，到德国魏玛的歌德书房，从勃朗特三姐妹的约克郡故居，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角落，将50位作家的创作空间一一铺展在读者面前。这些空间并非都是精致的书房，有的是简朴的阁楼，有的是温馨的卧室，有的是意想不到的台球厅、浴缸，甚至还有作家在火车上、汽车里、图书馆的凹室中完成了传世之作。雷·布拉德伯里在曼彻斯特的切塔姆图书馆写下《华氏451》，安东尼·特罗

洛普在火车通勤的便携书桌上完成《巴彻斯特大教堂》，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在卧室的下拉式隔板上创作出《小妇人》，这些细节打破了我们对于“创作空间”的固有想象，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创作之地，从来无关奢华，只关心心境。

书中收录的作家名单，几乎涵盖了世界文学史上的各个领域与时代，从经典文学的巨匠到通俗文学的大师，从诗人、小说家到剧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斯蒂芬·埃德温·金、村上春树、J.K. 罗琳……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写作风格，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都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创作结果”。而作者对这些空间的描写，并非冰冷的地理介绍，而是充满了鲜活的细节与人文温度，让每一个房间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性格。

我对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写作小屋印象深刻，这座原本计划作为游泳池更衣房的小屋，被她打造成了专属的“神圣空间”，除了她之外无人能入，甚至不能打扫。这里没有电话、没有网络，只有成箱的珠子、女儿葆拉的婴儿鞋与照片、母亲数十年来的信件，还有那台写下《幽灵之家》的打字机。

这些充满个人记忆的物件，成为阿连德创作的精神支撑，而她每年1月8日的所谓文学仪式，从清理旧物到点燃鼠尾草祈福，再到规律的写作作息，让我们看到，创作从来不是一场即兴的灵感爆发，更是一场与自己、与空间的温柔对话。这样的描写，让一个个遥远的文学大师变得鲜活可感，他们不再是印在书本封面上的名字，而是有着自己的执念、习惯与柔软的普通人。

《有故事的房间：伟大作家们的创作空间》的精彩，不仅在于它描绘了多样的创作空间，更在于它挖掘了空间与作家创作、性格之间的深层联结，让我们读懂了“房间如何塑造作家，作家如何赋予房间灵魂”。正如序言中引用的

伍尔夫的话：“凡是作家都会在用过的东西上留下印记，与其他人相比，他们的这种印记更难消失……使桌椅、幕帘、地毯都符合自己想象。”作家的创作空间，从来都是其个性的延伸，是其精神世界的外在投射。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创作空间，必然藏着他对人间百态的洞察；海明威的写作角落，定有他独有的硬汉柔情；村上春树的书桌前，想必摆着咖啡与爵士乐，呼应着他文字里的慵懒与深刻。而书中也细致地展现了作家们那些看似古怪却又无比可爱的创作习惯与仪式感：有人每天早上必须削一盒铅笔才能动笔，有人写作时离不开大量的咖啡，格特鲁德·斯泰因需要追踪一头温顺的奶牛来寻找灵感，德国诗人席勒则要在书桌抽屉里放烂苹果，靠着那独特的味道文思泉涌。这些看似“奇葩”的小癖好，并非无意义的矫情，而是作家们为自己建立的创作仪式，是让自己从日常进入创作状态的“开关”。而这些仪式与空间结合，便形成了独属于每个作家的创作密码。

同时，作者也从这些千差万别的创作空间与习惯中，提炼出了关于创作的普世真理，无论作家的创作空间如何不同，有三个要素尤为重要：一是拥有一个免受干扰的独立空间，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也是让自己沉下心来；二是懂得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不强求完美的创作环境，火车、卧室、隔板，皆可成为写作的天地；三是把握创作的最佳时机，即便以“夜猫子”著称的作家，也大多会在上午开启写作。

这些道理看似简单，却戳中了当下许多创作者的痛点，我们总在抱怨没有合适的创作环境，却忽略了真正的灵感，从来不是被环境所左右，而是被内心的专注所唤醒。《有故事的房间：伟大作家们的创作空间》用50位作家的亲



《有故事的房间：伟大作家们的创作空间》，[英]亚历克斯·约翰逊著，[英]詹姆斯·奥泽斯绘，重庆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能感受到文字诞生时的温度，能与作家的灵魂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而如今，我们即便无法踏遍世界各地的作家故居，也能通过《有故事的房间：伟大作家们的创作空间》，完成一场心灵的圣地巡礼，在字里行间，走进那些有故事的房间，感受那些经典作品诞生时的灵感火花。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注意力被不断切割的时代，我们似乎越来越难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也越来越难静下心来进行一场深度的创作与阅读。而《有故事的房间：伟大作家们的创作空间》，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之旅，更让我们重新思考空间与自我、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它告诉我们，无论是写作、读书，还是做任何一件需要用心事，我们都需要为自己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无关大小，无关奢华，它可以是书桌前的一个角落，是窗边的一把椅子，甚至只是一杯咖啡、一本书这样的方寸之地。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远离外界的纷扰，与自己对话，让心灵沉下来，让灵感生出来。

《有故事的房间：伟大作家们的创作空间》是一本关于“热爱”的书，它藏着作家对文字的热爱，藏着作者对文学的热爱，也藏着所有文学爱好者对经典的热爱。50个房间，50段人生，50种创作的可能，在这些房间里，我们看到了文学大师们的坚持与执着，看到了灵感背后的付出与沉淀，也看到了文字最本真的力量。

这些房间里的故事，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如同陈年的美酒，越品越香。而当它们合上书页，那些作家的创作空间与故事，依然会在我们的脑海中萦绕，让我们想要走进书房，翻开一本经典，或是拿起一支笔，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毕竟，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有故事的空间，而那间房间里，藏着我们最珍贵的热爱与初心。